

通商社会背景下开始接触西学，并从此走上一条有别于读经的生活道路。于是，迁沿岁月，逐渐形成了一批崭新的知识阶层。这批新阶层的兴起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和官绅顽固地坚持自我文化中心意识不放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教养和利益所致的话，那么，现在兴起的这批知识层的情况则不同了。他们接触西学的经历使他们有可能从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去观察和重新思考天下大势，从而引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一旦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喻示了摆脱“夷夏之大防”文化意识的契机。他们的文化思考和判断开辟了一条中国近代化选择的另一条通道，从而构成近现代中国文化意识酿成的真正的“前驱先路”，他们的业绩是不可抹杀的，人们应该记住这批先驱的英名：容闳、王韬、李圭、以及……

二 从世界看中国的第一人： 容闳心中的中西文化

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人亲历西洋的记载依然太少。虽然在容闳出洋之前，中国也曾有人游历西洋，如林鍼和罗森、斌椿和志刚等，但林、罗出身市井，斌、志家属八旗，不仅出洋无什么抱负和远虑。而且其思想之正统远比“布衣”为固，所以，他们的出洋的载记，并不具有更多的文化反思的价值，所有的只是客观的记录方面，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方面做出开拓性努力的当首推容闳，而容闳所以能入学读书，并能于早年出国赴美留学，本身就与当时的西学东渐的历史社会背景相联系。容闳晚年曾回忆当时弃读经之途的经历说：

“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①。

从一八四七年一月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在长达留美八年的学习生活中，容闳系统地接受了西学的教育，并以此反观中国当时的现实，更加感到中国的腐败、黑暗，从而也使他痛苦不已。容闳描述当时自己的认识和心情时写道：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能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②

面对清廷王朝的黑暗和腐败，龚自珍也曾感到压抑和痛苦，也曾尽吐自己感于时危的不快，但是，这种感受是从唐虞三代的仁政之治的文化心理出发的，这种感受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近代课题上看，就只能是盲目和自发的性质。洪秀全由自己的境遇出发而找到基督福音书，使他能够用西方“上帝”的观念来抒发他对传统中国现实的抨击情怀，但这是借助于宗教的信仰，常常与历史潮流相去甚远。所不同的是，容闳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洋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版。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1页。

学子,他是在系统地经过《人权宣言》和微积分的训练学习之后,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自由观念为背景,来反观中国现实的,所以,就与龚自珍和洪秀全不同,他的痛苦是建立在知识长进的基础上,建立在中西文化自觉理解的基础上,当然也就深沉得多。

容闳在美学习期间,深感中国的腐败与压制在于文明之不昌,所以,他在未归国之前便立下了用西学来改造中国的宏大志向: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①。

容闳赴美深造八年之后,学成毕业,他放弃了在美国获得公职和优厚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他并无靠山根基的祖国,开始致力于西学东渐、以西学改造中学,冀希中华振兴富强的努力。从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角度看,容闳以下的见解和努力,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对太平天国事业的看法和评价。容闳一回到祖国,就即被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所吸引,他深入到太平军中进行实地考察,给太平天国事业出谋划策,希望太平天国能干出走向新文明的伟大事业来。但是,他失望了。

原因是什么呢?容闳自然看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2页。

在于清朝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如他指出：“为一八五〇年革命之原因，则其所见浅陋实甚。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治贿成”^①。但是，由于太平天国的观念没有变，仍然是旧时代的那一套，所以他们就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提不出更高的水准和要求，这样的革命到头来，依然摆不脱历史上一般农民起义的旧模式。容闳曾不无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点，他说：

“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虽如此，战国以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非谓彼果英雄豪杰，以含有宗教性质耳”^②。

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虽然有重大的政治原因，但除了它的宗教特色以外，决无什么新鲜趣味。从太平天国在文化上只能陈陈相因，而在实质上只不过属于“一姓之废兴”的旧式革命看，它仍然应视为旧时代的产物，而并无什么增进历史精神可言。容闳的话虽然亦不免有些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这的确是掷地有声之论。太平天国在当时，除了清廷顽固派是它的坚决的对立面外，社会上许多阶层都被卷了进去，太平天国所表达的理想和愿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动向，因此，在当时，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几乎成了在历史潮流面前决定取舍的试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8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5页。

金石。而容闳却能从其历史的局限性上深刻地指出它的弊端所在,如果容闳没有西方民主政治这一文化背景作其参照系,这种认识便无可理解。事实正是如此,当容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不过是“一姓之废兴”,而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的状况时,也就从中西文化的对立上把问题的实质揭发了出来。

正基于此,所以容闳感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两面性质,即它既有其革命的一面,又有其落后的一面,犹如“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二面”^①。

正是由于这种两面性质,所以使太平天国在其事业中干了不少背离现代时代精神的事情。容闳曾指出,太平军将士的主要来源,是无业游民,都是些社会中最无知识的人,由这些无知识人组成的队伍,当然不会增加实力,反而会成为太平军的重累,而使兵力转弱。这种军队,既无知识,又无信仰,所以在财富与美色中,就经不起诱惑,当太平军占领苏杭等地后,很快就贪图享受而腐化起来;再加之太平军在自己已经占领的地区里,又不能提出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新政策,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太平天国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容闳从自己的亲身观察中体认到:

“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②。

所以,太平天国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政治改革而言,收获就显得微乎其微,其最大的价值,仅仅在于唤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8页。

② 同上书,第100页。

“简而言之，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中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①。

其次，是容闳从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中，深感中国的现代化应从教育入手，兼以全面地改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容闳毅然回到祖国怀抱，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努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都是那样的落后、腐败和不合时宜，所以都应从西方的文化中获得启发，进行全面的改革，而这个改革又以教育为其突破口。

所以，容闳一回到祖国，就立即四处奔走，约见各界人士，积极出谋划策，极力倡导派大批留学生出洋受系统教育，主张操办洋务，发展机器工业，要求实行新政策。他曾经不无坚定而自信地指出：

“予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②。

“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③。

所谓“新政策”，容闳提出的具体方法就是，先由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分别作为国家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的顾问，使中国按照这些顾问的意见重新组织并展开工作；并且，在政府中，应派更年轻的有才能的中国学生作为助手，使他们尽快成长。容闳深信，只要中国虚心听取这些有诚意的外国顾问的意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②③ 同上书，第150页。

见，按照西方已经证明成功了的模式来改革中国旧政府，那么，不出数年，中国统一就一定能获得振兴，走上富强之路。然而，当他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上述办法时，却得到了因言辞“太新太激烈”而拒绝采纳，这使容闳痛苦不已。

在致力于中国幼童出洋留学的努力中，容闳可以说是竭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虽然其中也有成效，例如毕竟派出了几批幼童出洋留学，但是由于清政府及其正统顽固派的一再阻挠，所以此事也终以失败而了结。在此数十年的努力中，使容闳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径庭之别，加深了其要改造中国旧文化的决心。

例如，当出国留学生被无端电召回国时，容闳就倍感中西文化之别，并且下决心要使中国有一个根本的改革，他曾痛心地说：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然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明，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①。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和回中国的境遇与感受，其反差竟是如此之大，致使人“不堪回首可知”，这其实正是中西文化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分野。不仅是那些尚未成年的中国留学生感触良多，业已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容闳更是感慨系之。

其实，问题又不仅如此。就留学与接受西方教育本身而言，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4～145页。

也实属中国历史上的破天荒事件，它必然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抵触也更可想而知。在容闳亲身经历中，事实上他一直处在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幼童留美受教育问题上他与中国正统的官员之间发生的分歧和斗争就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被委派为留学事务所的委员共两人，一个是容闳，而一个是陈兰彬。容是西学东渐的倡导者和力行者，而陈兰彬则是国粹顽固派的典型代表，容闳对陈兰彬种种做法和观念的剖析正表现出已经获得西方文化观念的人对仍固守传统观念的人的剖析，这正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反映。

陈兰彬出自于对中国传统圣道的维护，所以他将中国留学生在美直接受教育本身就看成离经叛道，因此一再将其指控为“污染”，要求予以废止。容闳则出于西学东渐、文化交流的目的，他站在振兴中华的立场上，对这种所谓“污染”论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容闳指出：

“陈兰彬自华盛顿后，与哈特福德永远断绝关系。

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故其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推彼意想，必以为其一已所受纯洁无瑕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①。

陈兰彬对西学的厌恶和鄙夷正是当时清廷和一般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定势。他们从文化自我中心的原则出发，自然要以为唯有传统中国的圣学孔道才是世界上唯一纯正洁瑕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7页。

学问,那么,与中国传统不同的西学能有什么好处吗?于是,与外国教育相接触,便被讥为“污染”,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中学与西学孰优孰劣,原因正在于沉醉于中学中的人由于习惯于服从和俯首,当然只能以极端封闭的心态来对待异质的文化。陈兰彬的态度正表明了这一点。容闳说:

“盖陈之为入,当未至美国之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思想”^①。

陈兰彬的态度,也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官绅的态度,陈兰彬对待文化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官绅的价值判断。可以想见,在如此浓重的刻骨铭心的文化偏见的氛围里,捷足先登,过早地接受了西学文明的容闳的西学东渐的努力究竟能坚持多久,能得到几多的收获?容闳在历经艰辛之后,愈益感悟到,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化,自然只靠教育是救不了中国的,而中华庶几富强的愿望也就只是空谈而已。于是,容闳在倡导留洋和办洋务失败之后,自然地走向了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一道谋求变法的新道路。

从教育入手,到办洋务,再到变法,容闳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努力,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日益接触了中国社会的病根所在。但是,容闳的先觉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普遍觉醒,他的西学东渐的努力所获得成功的程度,受到了中国社会文明度的制约。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7页。

他满怀豪情毅然回到祖国，要为中华富强振兴成为欧美那样的新国家而奋斗，但是，到头来不仅国家没有振兴，连他本人也不得不已的在垂暮之年又一次背井离乡返回美国，直至饮恨辞世。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不幸，倒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三 王韬笔下的文化差距

在鸦片战争以后最初的几十年里，能够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中，王韬是尤其值得提及的先驱者。

王韬的经历与容闳的不同之处在于，容闳从小就受的是西学的教育，后又赴美接受系统教育直至大学毕业，以致于他在美国学成归国时，竟一时不会用中文讲话。而王韬则不同，他出生吴地，从小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十七岁便以全县第一的好成绩考中秀才。只是由于他因贪恋酒色，在省里应闱试而失败后，才抱着“读书十年，然后出为世用”的雄心潜心学问，并从此进英人办的“墨海书馆”里以自己的汉文优势协助英人搞翻译工作，然后才应邀赴英国和日本实地考察，从而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的。如果说，容闳由于从小受到西学的训练从而西方文化功底好而中学底子浅影响了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的话，那么，王韬则是在饱读诗书之后才走上西学的道路，从而这些经历使王韬能够在比较全面的范围内和比较深的层次上对中西学进行思考，因此，王韬在中西文化上的看法，就有其比较明显的特长。

王韬一次考试不第，便从此告别了传统社会士子出人头地的正常道路，而在大家都鄙夷西人西学的氛围里，毅然进入“墨